

The Production of Concepts
and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观念的生产 与知识重构

周宪 陈蕴茜 / 主编

审美、治理、自由 / 托尼·本尼特

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 / 顾杉

西方美人与东门之女 / 张伯伟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 / 周晓虹

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 许纪霖

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 陈思和

形塑中国：以汉、唐、宋为例 / 许倬云

从唐诗看唐代 / 宇文所安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The Production of Concepts
and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观念的生产 与知识重构

周宪 陈蕴茜 / 主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的生产与知识重构/周宪,陈蕴茜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

ISBN 978-7-108-04298-9

I. ①观… II. ①周…②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8133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 数 358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前 言

摆在面前的这部 30 多万字的文稿虽算不上鸿篇巨制，但却是沉甸甸的。说它沉甸甸，并不是说它有多重，而是说凝聚在这些精彩演讲中的思想的分量。作为亲历这些演讲的听众，也作为本书的编者，我们有感于这沉甸甸的思想而不得不写上几句话。

选编在这里的文章，是 2010—2011 年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演讲的精选。来自四面八方的演讲嘉宾们，有的飞越大洋不远万里来到南京，有的从大陆其他地方或台湾地区前来南京，还有几位本校学者，他们不辞辛苦，为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奉献了如此精彩纷呈的演讲，委实让人叹服并感佩！

这些演讲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归纳出四个不同的主题，将这些文章分门别类地安排在四个部分中。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现代知识生产中的核心概念”。我们知道，今天的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就是新概念的的生产。英国学者威廉斯曾在其著名的关键词研究中发现，一个时代往往会有一些彼此关系密切的概念同时出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关键词的结构，由此深刻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和文化，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地图。在这一部分的几位演讲者中，本尼特讨论了“审美、治理和自由”三个概念，施旭则集中解析“话语”概念，王宁重提近几年越来越引起关注的“世界文学”概念，而尹晓煌则透过美国华文文学来审视“种族、阶级和性别”三个文化批评的关键词，一向激进的美国戏剧家谢克纳，把艺术和恐怖主义关联起来，重新定义了“先锋派”的政治意义。这些重要的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并无联系，但是，如果我们细读这些篇什并仔细聆听演讲者的声音，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关联，就像威廉斯所说的那样，

它们构成了一个我们时代知识和观念的概念结构,透露出学者和学界在关注什么和强调什么的种种信号。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跨文化交往中的理解与纷争”。此一主题所触及的问题无非是如何看待自我和他者及其差异与理解。这部分所刊出的演讲稿,既有外国学者反观中国文化或文学的尖锐批评,比如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也有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反思国外汉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比如华裔学者顾明栋对西方汉学主义的思考;既有对华夏文明“西来说”的考辩,如留日学者孙江的研究,亦有对西方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间如何互通交往的分析,如华裔学者夏伯嘉的文章。另有两篇文章,一是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路漫漫其修远兮,是著名作家毕飞宇和法国汉学家的对话录,另一是说西方总是对中国、中国文化存有偏见,因此对西方讲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如何讲出历史多元和未来可能性,华裔学者唐小兵就此贡献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诚然,跨文化交往本来就充满了差异、误解和纷争,随着中国崛起,未来的中国研究该是什么局面?张伯伟的演讲做出了一种推测,“21世纪的中国研究,应该返回东方、返回亚洲、返回中国。然而从中国出发不是局限于中国,而是要以文化圈为单元,以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为参照,在更深入地理解汉文化的同时,也提供一幅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图景。这是用任何别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

第三部分的主题集中在“现代语境中的本土问题”上。四篇文章主旨各有不同,中产阶级的建构乃是中国当下社会发展值得关注的现象,它与全球化和中国的社会转型关系密切,这是周晓虹演讲的焦点。许纪霖则直接提出了“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的追问,着力讨论了当下解构启蒙的三种力量,通过进一步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对如何重新启蒙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陈思和对土改题材文学的思考围绕“官方表达”和“客观表达”两种不同的土改文学表达展开,提醒人们官方文献中找不到暴力记录,这些记录却可以在文学中得以留存的重要现象,为人们理解和解释土改及其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最后,华裔学者王政对《中国妇女》杂志进行了文本解读,考察了新中国建国之初党内的社会性别矛盾和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劳动妇女视觉再现的文化改造意义,揭示了该杂志作为国家女权主义话语实践场所的重要意义。四位演讲者所触及的问题迥异且相互纠结,从不同层面解释了中国现

代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晚近多元现代性或另类现代性的讨论很是热闹,其中一个题中之义就是非西方现代性的路径和特征。这些演讲紧紧抓住现代性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对理解中国本土的现代性的独特性有所裨益。

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回归传统与传统的再发明”。“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来自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他强调传统总是依据当下情势而不断地再发明。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合逻辑,传统就是传统,怎么再发明呢?其实,霍布斯鲍姆说的是传统不是一个僵死的过去,而是存活到当下并焕发生命力的活的东西。当下的文化、学术,甚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都需要重新确立与传统的某种联系。所以,传统的再发明是一个永恒延续的过程。许倬云的演讲把听众带回到汉、唐、宋三代,他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发展转变的宏大故事,勉励青年人为文化“招魂”,把汉朝的厚重、唐朝的宽宏和宋朝的自由发扬光大。宇文所安的演讲着力于考量唐诗和唐代的关系,通过文本细读和文献分析,对杜甫、王维等诗作的价值提出了新的见解。作为一个美国汉学家,他对文献的把握和文本的解读给人印象深刻。康韵梅对《莺莺传》的讨论,着力于情爱悲剧的文化意义的探究,并做出了自己独到的判断。周启荣的文章对明清的印刷文化展开了探讨,特别是市场化问题,诸如书籍成本、价格及其价格体系,他认为这些对于书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来说,是一些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俗话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任何演讲亦复如此。好在演讲嘉宾们虽然离去,但留下了他们思考的足迹,留下了睿智的文字。当我们重温这些文字时,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报告厅的场景再次浮现在眼前。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聆听这些讲座的读者,也可以透过这些文字走进报告厅,和各方嘉宾对话与切磋。

编者

2012年冬于南京

目 录

现代知识生产中的核心概念

3 审美、治理、自由 / 托尼·本尼特

22 文化话语研究 / 施 旭

31 “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 / 王 宁

45 种族·阶级·性别——论美国华文文学的主题和素材 / 尹晓煌

88 作为先锋派艺术的“9·11”恐怖袭击 / 理查德·谢克纳

跨文化交往中的理论纷争

109 黄帝自巴比伦来 / 孙 江

141 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 / 顾 彬

151 我所理解的顾彬 / 王彬彬

157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 / 顾明栋

174 西方美人与东门之女 / 张伯伟

182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还很长 / 何碧玉 毕飞宇

191 作为中欧文化调停人的耶稣会士 / 夏伯嘉

199 怎样对西方讲述中国故事 / 唐小兵

205 近代东亚报刊史研究的思考 / 潘光哲

现代语境中的本土问题

221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 / 周晓虹

237 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 许纪霖

252 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 陈思和

280 创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阵地：《中国妇女》(1949—1966) /
王 政

回归传统与传统的再发明

311 形塑中国：以汉、唐、宋为例 / 许倬云

319 从唐诗看唐代 / 宇文所安

324 与爱睽违——《莺莺传》新论 / 康韵梅

343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 周启荣



现代知识生产中的核心概念



审美、治理、自由

托尼·本尼特*

如何看待文学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是由文学批评家格纳厄姆·马丁(Graham Martin)提出来的。在他对文学与自由之间密切的、几乎是内在的联系所作的估价中，在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阿诺德·科特爾(Arnold Kettle)的“文学在解放的过程中可以做出自身特殊的贡献，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文学产生这一效果”^①这一观点的赞同中，马丁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我在此处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freedom effects)，而是要探讨那些使得马丁所倡导的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历史及其推论的条件。在进行这样的探讨时，我将拓宽自己关注的焦点，超出文学的专业领域，将更加一般地概括审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我提出这些问题的视角是由关于自由治理及其角色的后福科论争所提供的。这些论争一致认为自由不是治理的对立面而是对于治理的运作具有重要作用的机制。这将涉及多方面的考虑：其中的文学、审美及自由之间的诸种关系已经作为治理的一个独特领域的诸组成部分而产生了影响，而不是作为治理的外表，能够以解放的名义为其超然的批判提供基础。

我在此处关注的问题的一部分，尽管更多的是作为背景而不是作为其中心，是要为滋养了马丁对批评的作用之理解的左翼利维主义(the Left Leavism)提供一个历史的框架。我将其渊源关系追溯到把文化当作自由的

*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男，1947年出生，当代英国文化研究领军人物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现为英国开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教授，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人文学院研究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交流学院专职研究员。

① 摘自大会组织者文学与解放大会准备的新书推介说明。

一个领域的后康德式(post-Kantian)建构。^①一如康德所说:“理性的实体为了任何出于它自己所选择的任何目的的才能的生产,从而也就是存在于自由中的实体的才能的生产,就是文化(Kultur).”^②(康德,转引自凯吉尔)^③康德对于审美、文化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论述在英国所产生的影响,在其形式方面当然非常突出。与其在德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他的论述没有产生形式化的美学理论传统,它的影响毋宁是通过柯勒律治和浪漫派传播的,^④并因此而通过它与品格问题的联系而得到传播。品格问题使得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直到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自由政治思想都关注有关教育之作用的论争。^⑤但是,在20世纪的深处,我们也能够听到它的回声。

例如,我们能够在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知性人生》(*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中听到这些回声,他在这本书中描述了数代工人阶级的学生所受的文学或艺术教育的作用。无论这些学生是在WEA(“工人教育联合会”),或者是在拉斯金学院(在牛津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开办的一所专科院校),他们都表达了对这一教育的裨益的感激,而且他们恰恰是依据无功利性与自由的双重关系,以及它们对自我及社会改革的影响来表达其看法的。这就是康德的遗产。

例如,让我们从以下取自1936年对“工人教育联合会”学生的《学习与生活》(*Learn and Live*)调查中有关教育价值的评价为例:

(1) 重视心灵和精神的事物,激励一种将人置于第一位而将他的经济功能置于第二位的精神态度,倡导自由同商业主义分离;倡导无功

① 我所关注的问题的这些方面同弗朗西斯·穆赫伦对元文化的论述的那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与之也有区别。Francis Mulhern, *Culture/Meta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参看本尼特有关这些问题的更加充分的阐述 Tony Bennett,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Vol. 21(4-5), pp. 610-629。

② 作者原文指出,这段语出康德的引文转引自凯吉尔1981年出版的著作。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似即指后文多次提及或引用的凯吉尔的《判断的艺术》(Howard Caygill, *Art of Judge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一书。而且在文末所附全文参考文献中,也未见作者提及凯吉尔1981年的任何著述。

③ Howard Caygill, *Art of Judgement*, p. 389。

④ Ian Hunter, “The History of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2006, Vol. 33 (Autumn), pp. 78-111。

⑤ N. Roberts, “Character in the Mi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 Britain, 1880-1914”, *History of Education*, 2004, Vol. 33(2), pp. 177-197。

利。我相信,所有这些都能激励学生投身社会服务。

(2) 到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有些人完全懂得并享受生活。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为他们自己解决了人生的难题,而世界的其他人则不过是苦力、奴隶和酒鬼,因此我并不希望被划分为后一个阶层。^①

我们还能在文学批评家约翰·凯瑞(John Carey)提出的主张中听到这些回声。凯瑞认为,阅读文学或许可以作为喝闹酒的有效解毒剂。^② 在其论战性的《艺术之善何为?》(*What Good are the Arts?*)中,凯瑞探讨了《泰晤士报》上刊载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两个15岁的女中学生将她们的喝闹酒解释为逃避格娄塞斯特郡狭小的乡村生活烦恼的一种尝试。凯瑞将此与公共图书馆的衰落联系在一起,指定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对心灵的提升和对生活的改变,可以逃避厌烦,这同毒品、饮料以及抗抑郁症药物仅仅提供的短暂逃避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他将接触文学视为通过惩罚性或矫正性措施尝试处理喝闹酒问题的可行方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诱使工人离开酒吧,进入图书馆或艺术画廊,作为同酗酒以及与之相伴的所有社会弊病(打老婆、性乱交,以及未受抑制的人口增长)作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19世纪梦想的当代版本。^③乍看起来,上述这些回声或许似乎是有关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关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作为对必然性的逃避,文化将对于知识的自由追求再现为存在于它自身中的目的;第二,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的手段来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但是,这两种反应是紧密相连的:英国的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史,^④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在这一自由表达空间中,通过他们对文学文本的反应,学生们受到鼓励,在一种

① Jonathan Rose,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Nota Bene, 2002, p. 284.

② John Carey, *What Good Are the Art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5.

③ Tony Bennett, "Acting on the Social: Art, Culture, and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ce*, 2000, Vol. 43, No. 9, pp. 1412-1428.

④ Richard E. Lee,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受到特别控制的背景(指导的背景)中,按照经验丰富的读者(导师)以及他们的同学的指引,以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受到矫正和修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自我。“它的基本特征”在谈到“工人教育联合会”的教导班时,阿尔伯特·曼斯布里奇(Albert Mansbridge)说:“是自由。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名老师,每一个老师都是一名学生。”^①的确,正如伊安·亨特(Ian Hunter)在咄咄逼人的细节中表明的,恰恰是这种将文学用作自我修养的精英模式更加普遍地通过公共教育体系以及成人教育向人群的延伸,把文学课程摆在了自治的新机制的核心。^②

我在此想要提出的论点是,如果我们打算理解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之特质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一件工具。我将首先审视康德转换无用性或无功利性与它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联系的方式:在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的文化中,无用性或无功利性曾一直被归于审美判断;在康德对克里斯汀·沃尔夫(Christian Wolffe)的美学与普鲁士政府的警察学(Polizeiwissenschaften)之间关系的批判中,无用性或无功利性发挥过重要作用。^③接下来,在回来把这些历史游历同目前与审美、治理与自由之间关系利害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之前,我将越过康德,回顾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的美学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内在的人”(man within)在18世纪自由治理诸形式的发展中的关系。

一、从治理到自治

沃尔夫的《哲学王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生活》(*The Real Happiness under a Philosophical King*)对于他构想的应该在哲学家与治理之间获得关系的观念做出了简洁的概括。他的理想是,“如果国王或统治者哲学

① 转引自 Jonathan Rose,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p. 276.

② Ian Hunter, *Culture and Government: The Emergence of Literary Educ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③ 我注意到,以这种方式将康德当作一个“铰链”来使用具有重重困难,因为它承认了他对以前的命题的超越。这些命题是他通过自己的辩证批判而为自己提出来的(参看 Michel Foucault,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不过,对于我的研究的这一阶段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十分方便的描述性手段。

家,或哲学家是国王,那么社会的目的就达到了”。此处的这一目的被设想为一套由规训(police)原则所统辖的有序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当哲学家—国王有能力带来“最高的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个体,按照他们所处的不同国家,都能获得这个最高的善时,“共同的善”就得到了确保。^①就此而言,哲学的作用存在于小前提判断的逻辑中,这就是说,存在于它将每一种特别的情况都置于决定性概念的标题下的能力之中,以便共同的善的要求能够在一个接一个的情况下准确而一致地被确定。

对于沃尔夫来说,关于美的诸种判断提出的困难涉及它们对于较低级的直觉能力与较高级的理性能力之间关系的多种含义。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普鲁士警察国家的背景中,这较高级的理性能力作为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就是说,在一方是君主及国家官僚的开明专制主义,以及另一方是他们不开明的臣民之间)关系的被编码的参照而起作用。如果美能够作为完满的一种形式明显地被直觉到,并且因此而潜在地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以获得的,那么,这与由较高级的理性能力获得的关于完满的理性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被转换成关于统治手段的问题时,就涉及美的问题而言,假如人民被允许有判断的权力,人民混淆的理解力与国王和哲学家们引导国家治理的包摄性推理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允许关于美的直觉的或者感觉的理解力的存在而言,沃尔夫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它处于被明确的判断规则所支配的对美的理性鉴赏的影响之下所带来的校改和修正为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这样一来,较高级的能力就提升了较低级的能力,使它脱离了对完美的混淆而模糊的鉴赏,这正如开明的统治者打算通过教导的纲领,将不开化的人从混淆和模糊中提升出来。这一纲领是自上而获得合法性的,并不涉及被统治者这一方的任何自我活动。

在这一霍布斯式观点的复兴中,多方面的统一源自主权(sovereignty)的政治行动,社会秩序是自上而被治理的,正如较低级的能力是由较高级的能力所安排的一样,即由按照他们对共同福利的理性理解而治理国家事务

① Christian Wolffe, *The Real Happiness of a People under a Philosophical King*, London: M. Cooper, 1750, pp. 4-5.

的国王和哲学家官僚所治理的。这样,治理就避开了公民社会的个体成员,他们如同被强制进入了自由和自治之中,而不是要么像自然属性一样拥有自由和自治,要么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动而获得它们。公民的作用就是通过学习,经由公开的讨论,被引入自愿的服从,被引导着去理解体现于法律中的理性。然而,通过将与较早的、未开化的主权形式相联系的表演政治的永久化,普通人则要被引入盲目的服从:

普通人依赖他的感官,而很少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因而不能够理解王权是什么。但是,通过他经由自己的双眼捕捉到的事物,以及影响他的其他感官的事物,他以一种虽不确定但明白的概念认识了王权、强权和力量。^①

正是作为沃尔夫否认任何被普遍分配给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一个后果,审美的问题才在18世纪中晚期的德国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通过探究其与有关美的诸种判断的解释相联系的困境(aporias),凯吉尔挑选出了两个人物,他们在摧毁沃尔夫的哲学体系的结构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鲍姆嘉登和赫尔德(Baumgarten and Herder)。就其寻求为承认审美是一种确定的而且独立的能力奠定科学的基础,并因此影响到了感官对理解的循序渐进的服从而言,鲍姆嘉登的早期著作习惯上被认为仍然属于沃尔夫体系的秩序之内。尽管凯吉尔同意鲍姆嘉登的这种看法,他仍然认为,鲍姆嘉登在他后来的《美学》(*Aesthetica*)中使得关于美的感知判断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既连贯又不连贯,其方法是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新关系的可能性敞开大门。在这部著作中,既然审美判断与理性知识仅仅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种类上有区别,而且,对于鲍姆嘉登来说,既然审美是作为并不会自动地从属于较高级的理性法庭的独立判断的一个领域而操作,("我对事物的完满与不完满的鉴别就是判断,因此,我拥有判断的力量。")^②那么,审美就作为存在于仍处于判断(人民/公民)对理性(国家)的监护性关系的背景中的自

① 沃尔夫语,转引自 Howard Caygill, *Art of Judgement*, p. 109.

② 鲍姆嘉登语,转引自 Howard Caygill, *Art of Judgement*, p. 164.

我活动的一个领域而被敞开了。赫尔德的《论雕塑》(*Sculpture*)更加激进地将判断力置于感官的动态系统之中,与绘画相联系的视觉在其中所拥有的特权由于从属于触觉而被褫夺了。对于感官系统来说,这是作为组织中心而起作用的。在这个感官系统中,社会并没有被“好像在看得见的表面上高人一等的眼睛所命令”,^①而毋宁是随着公民通过他们与雕塑的关系,把他们自身塑造成供他们自己凝视的对象,社会就产生了。在他为赫尔德的著作所撰写的导言中,雅松·格雷戈尔(Jason Greiger)把公民与雕塑的这种关系描绘为“空间上的看和有关触觉的回忆的”联合。^②于是,此处的判断是一种建构性活动——自我雕塑的一种反思过程与视觉的范式以及它的“被动的、被规训的主体的必然结果”决裂。^③

上述这些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需要与之对照的一些相关的同等观念。^④该书出版于1790年,它在导致1806年改革的论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就其通过将审美刻写在公民社会所规定的作为自我塑造过程的文化概念之中而为审美所创造的地位来看,1806年的改革标志着从警察国家向立法国家的转变。康德对审美判断的无功利性的论述,出现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清楚地表明了将这三种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由的实践互相补充的部分而和谐地结合起来的逻辑,它本身补足了康德对沃尔夫以国家为中心就理性所作的论述的解决办法。为了其实施,理性必然依赖于总括性原则。有鉴于这些观念都要求所有的对象被统摄于普遍性之下,康德的体系就是一种有关系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判断力决定着体系或视域之内的对象之间的吸引与否定的真实关系,决定着由产生于知识能力、欲望能力以及情感能力中的主体的气质所确立的关系的真实关系。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认为,康德为了使他对三种能力的论述同自由的实践相调和,他就寻求在每一种能力的情况下

①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culpture; Some Observations on Shape and Form from Pygmalion's Creative Drea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185.

②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culpture; Some Observations on Shape and Form from Pygmalion's Creative Dream*, p. 16.

③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culpture; Some Observations on Shape and Form from Pygmalion's Creative Dream*, pp. 181 - 182.

④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 S. Pluhar),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